

天地 间气

范仲淹研究

王瑞来 著

王瑞来学术文丛

旧时，多用「间气」来形容上应星象、禀天地特殊之气、间世而出的英雄伟人。朱熹称范仲淹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可谓是极高的评价。如果按天文学描述天体的亮度来形容，在人才辈出的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范仲淹绝对称得上是一等星。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王瑞来学术文丛

天地 间气

范仲淹研究

王瑞来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王瑞来著.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 8
(王瑞来学术文丛)
ISBN 978-7-5440-7750-7

I. ①天… II. ①王… III. ①范仲淹(989~1052) — 人物研究
IV. ①K827 = 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0627号

天地间气 ——范仲淹研究

TIANDIJIANQI

出品人 雷俊林
出版策划 孙 轶
责任编辑 樊爱香
复 审 杨 文
终 审 张沛泓
装帧设计 王春声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0351-4035711 邮编:030002)
印 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91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0-7750-7
定 价 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351-7337712

自序

旧时，多用“间气”来形容上应星象、禀天地特殊之气、间世而出的英雄伟人。朱熹称范仲淹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可谓是极高的评价。如果按天文学描述天体的亮度来形容，在人才辈出的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范仲淹绝对数得上是一等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思想，跨越了国界，至少在汉字文化圈地域内，成为政治家的道德楷模。在日本冈山，有一片始建于15世纪初叶的园林，是日本的三大名园之一，叫作“后乐园”，园名就出自上述范仲淹的名句。无独有偶，在东京市中心，有一处幽静葱郁的美丽庭园，也叫作“后乐园”。由此可见范仲淹精神的影响所至。

历来多为研究者瞩目的，是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防御西夏等这些政治和军事的建树与事功。然而，除此之外，范仲淹研究还有更多的领域有待扩展。太宗朝开科取士蔚成规模，真宗朝制度建设底定，澶渊之盟的缔结带来和平环境，在士大夫政治的大环境下，范仲淹引导了宋朝的精神建设。在我看来，这是范仲淹最具时代意义的一个方面。这其中包括提携“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和张载、李觏，对于理学创生的促进；包括亲身参与古文运动，且站在高位对北宋古文运动的推波助澜；还包括与欧阳修等人一起对五代以来士风的道德清理。对此，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一语中的地指出：“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范仲淹代表着一个时代，在他身上隐含有解码时代的要素。

从政治史的视点看，伴随着仁宗亲政对刘后执政时期的政风扭转，范仲淹与权相吕夷简的政争恩怨，也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可以

说开启了后来党争的端绪。这些又成为解读北宋政治史的关键。而范仲淹通过政治言行对先秦思想宝库的再发掘，则不仅限于宋代，更是成为后世官僚士大夫处理君臣关系的基本理论资源。

因此，尽管我的研究范围跨越于北宋、南宋，但范仲淹则一直是我最为关注的人物。我曾因科研项目之需，三十年来三次全面校勘整理过范仲淹的诗文集，对范仲淹的著述相对熟悉；通过具体整理，从中发掘出一些不大为人注意的原始资料。本书汇集的，就是运用这些资料，历年来所撰已刊和未刊的十几篇文章，共分为思想研究、政治研究、生平考证、作品研究、言行杂论五个部分，是对范仲淹进行的综合研究。上述在我看来范仲淹最具意义的诸方面以及北宋前期的党争等内容，本书均有论及。本书虽说不是一部架构完整的范仲淹传记，但从其生平事迹到政治活动，从其思想渊源到人格理念，从其文学成就到生活日常，还有其作品的辑佚、辨伪、校读以及言行散论等，由此构成了一个范仲淹的全息影像。

除了先秦的孔孟，后世近乎圣人者几希。宋代士大夫政治造就的杰出人物范仲淹，便是一位超越了宋代的中国传统知识人精神世界的圣人。透过本书的文章，相信读者不仅可以对范仲淹本人有一个逻辑的把握，而且滴水映日，知人论世，还可以透过范仲淹体察到本书所言的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可以领略一个文明昌盛的时代。

对于范仲淹，我并未刻意地去锦上添花，顶礼膜拜。千百年来，称颂的文字已经连篇累牍，无须我来添加。如果我继续歌德，研究高度甚至还不及前人。朱熹就一方面称颂范仲淹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一方面还具体指出其“亦粗，不精密，失照管处多”。因此，除了探索时代意义外，爱之不增其美，尽可能秉持客观而理性的意识，穿过耀眼的光环，剥去层层附加的油彩，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还原出一个接近真实的范仲淹，便成为我的研究的另一个指向。书中收录的文章，既有从大处着眼的宏观叙事，也有从小处落脚的微观考察。力图挖掘出史料蕴



涵的有意义的细节，揭示出通常研究所忽略的一面，解决存疑而有争议的问题。通过本书，期待复活一个生活的范仲淹，一个有情有爱有血有肉却没有光环无需仰视的范仲淹。至于我的努力实现了多少，要由读者评说。

著述和出版，其实也跟范仲淹做的事业相近，是一种精神建设。玉成学者著述，让范仲淹走近读者的是孙轶先生和责编樊爱香女士，我对她们抱有深深的敬意。

王瑞来

甲午仲春之识于千叶寓所

目 录

思想研究

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

——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 3

将错就错：宋代士大夫原道试探

——以范仲淹君臣关系论为中心的考察 31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范仲淹《灵乌赋》发覆 50

政治研究

试论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一个因素

——读范仲淹致叶清臣信 67

范吕解仇公案再回首

- 历史阐释个案透视 73

生平考证

“范仲淹”问世

- 文正归宗更名考实 101

《范文正公年谱》抉误

- 范仲淹生平事迹考辨 112

范仲淹三至杭州考实 131

庆朔堂前艳闻飞

- 从范仲淹风流韵事公案看宋代士大夫生活日常 137

作品研究

- 《范仲淹集》点校说明 163

- 《范仲淹集》版本问题考辨 167

- 范仲淹与北宋古文运动 185

- 范仲淹《题叶氏卷》诗辨伪 201

- 《范仲淹集》校读札记 205

- 范仲淹集外佚文辑录 248

言行杂论

- “庆历省县邑” 291

晁仲约该不该杀？	
——范仲淹如何解读玉碎与瓦全	295
“执法之官，患在少恩”	
——范仲淹笔下的狄仁杰	298
当拆迁遇上范仲淹	30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305
“一成不变”变奏	308
“在德不在险”	311
“忍把浮名……”	
——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	314
“教子读诗书”的背后	317
参考文献	321
文丛跋语	333



思想研究

历史不仅是一种事实的叙述，同时还是一种后人的评价。后人总是依照自己的时代价值观与利益取向来评论历史人物。因此，历史人物的真实度总与其生前有着一定的距离。正如生前的孔子与死后的孔子大相径庭一样，成为精神象征的范仲淹也与生前的范仲淹不尽一致。尽管我们要区别对待，但毕竟精神的范仲淹是从生前的范仲淹发展而来的。这就是我们要研究历史人物的意义所在。

——摘自《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



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

——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

绪说

在中国，一个改革家，特别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家，在他的生前身后，往往非议甚多，以致盖棺难以论定。然而，主持宋朝历史上第一次重大改革“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则是个例外。

朱熹评论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①

刘宰评论他：“本朝人物，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②

^①《范文正公集》附录《诸贤赞颂论疏》，《四部丛刊初编》本。（按，书中注释提及各种典籍，原则上，不再加注版本，读者可由书后《参考文献》中得知版本信息。——编者）

^②《范文正公集》附录《诸贤赞颂论疏》。刘宰为理宗朝名流，传见《宋史》卷四〇一。

范仲淹的改革同道韩琦评论他：“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①

宋代最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评论他：“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②

前贤邈远，近哲可师。在宋代，乃至后世，这个失败的改革家，则成为士大夫精神世界中的圣人。

范仲淹为什么会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为什么会得到如此之高的精神地位？同样是改革家，王安石的身后为什么竟是毁誉参半，而范仲淹则是“名节无疵”？

以往，人们评论范仲淹，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范仲淹的事功上，集中在范仲淹如何主持“庆历新政”和抵御西夏这两件大事上。^③诚然，这是范仲淹的主要活动，不应当忽视。然而，人们却很少去探讨形成范仲淹这些事功的原动力是什么，在这种原动力的推动下产生了什么样的行为准则与行为方式，而形成这种原动力的时代背景又是什么样的。如果没有一种精神上的原动力，范仲淹会有如许事功，会得到如许评价吗？在这里，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一下范仲淹。我以为，这样的研究或许有助于人们对宋代士大夫社会与士大夫政治的认识，乃至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主流精神的认识。

①《范文正公集》附录《祭文》。

②《范文正公集》附录《祭文》。

③迄今为止，有关范仲淹的研究论著相当多。主要有刘子健的《范仲淹梅尧臣与北宋政争中的士风》（《东方学》，1957年第14期）、漆侠的《范仲淹的历史地位》（《中国历史人物论》，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王德毅的《吕夷简与范仲淹》（《史学汇刊》，1971年第4期）、程应镠的《范仲淹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陈荣照的《范仲淹研究》（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竺沙雅章的《范仲淹》（日本白帝社，1995年）、方健的《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上述的范仲淹研究包括笔者在本书中的《试论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一个因素——读范仲淹致叶清臣信》、《范仲淹三至杭州考实》、《范仲淹集版本问题考辨》、《范仲淹与北宋古文运动》在内，均无自本文角度切入者。本文以范仲淹为个案，试图窥见宋代士大夫乃至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精神之一斑。

一、“荷国家不次之遇，思所以报”——报恩论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这是宋人编次并广泛流传的《神童诗》^①的第一首。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宋代朝廷与士大夫的关系以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范仲淹晚年也作过一首诗，作为对自己仕途的回顾和对乡人的劝谕：

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余。

百花春满路，二麦雨随车。

鼓吹迎前道，烟霞指旧庐。

乡人莫相羨，教子读诗书。^②

如果说以上两首诗是以笼统和含蓄的笔触来表达一种观念和意识的话，那么，相传出自北宋第三代君主宋真宗之手的《劝学诗》，则是十分通俗浅显地告诉人们，天子是如何“重英豪”的，并且形象地向人们晓谕了为什么“唯有读书高”的道理。诗云：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①《神童诗》，北宋汪洙编纂于元符年间，后世有所增益。作为开蒙教材，近代以前，在民间广为流行。

②按，此诗未收录于现存《范文正公集》，见于北宋王辟之撰《澠水燕谈录》卷四及南宋楼钥编《范文正公年谱》。然文字略有差异。例如，《年谱》中“三纪”作“二纪”，“二麦”作“二月”。《年谱》将此诗系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即范仲淹进士及第时所作。实误。理由如下：第一，系年与诗所云“三纪”或“二纪”不合。古代纪年，以十二年为一纪。“登荣三（二）纪余”，当指进士及第的三十六年或二十四年后。据此可知，此诗当为范仲淹晚年的作品。第二，诗中的“二月”也与进士合格发榜的时期不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记载，范仲淹进士及第的大中祥符八年合格发榜是在年三月。详见本书中《〈范文正公年谱〉抉误——范仲淹生平事迹考辨》。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①

这些诗，尽管都是毫无例外地诱人以功利，但在客观上却反映出一种观念。那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是可以通过读书来获得的。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在宋代以前，是缺乏形成这种观念的现实条件和社会基础的。然而从宋代开始，自身获益的体验与官方的提倡，以及“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②的现实，则像春雨入土一样，滋润并助长着世世代代的庶民与士大夫的梦想，而这种光荣与梦想又不断地激励着他们的进取心。于是，宋真宗的诗演化成为民谣“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故而，始盛于宋的科举制度，历千年而不衰。

不可否认，利，对任何人都是一种诱惑。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唯利是图。犹如“器”之于“道”，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是以科举之“器”，来实现其理想之“道”。自古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里，一直流淌着一种责任意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不过，这种责任意识，由于客观环境与统治者的政策等因素，在许多时期里，使许多士大夫得不到舒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种门阀制度及其残余观念一直影响到唐代。这样就使大多数士大夫难以“达则兼济天下”，只好转而“穷则独善其身”。一部分人因此而遁入山林，走向了积极入世的反面，做了隐士。中国古代的隐士现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治上极度压抑之下产生出来的一种畸形解脱。

宋代则不然。从客观政治现实来看，唐末五代的大动荡，较为彻底地荡涤了残余的腐朽门阀观念。在宋代，已经基本上找不到唐代政治生活中常常

①〔宋〕黄坚选编，熊礼汇总校：《古文真宝》卷一《真宗皇帝劝学》。

②〔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出现的士庶之争了。此外，五代时期政权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更迭，打乱了固有的政治秩序，打散了传统的政治组合，也不可能形成和平时期出现的那种牢固的“门生故吏”式的政治派系。这就给绝大多数士大夫步入仕途提供了一种相对平等的机会与可能。

此外，从统治者的主观意图来看，赵宋王朝鉴于历史上出现的魏晋门阀政治、隋唐集团政治、五代武人政治的弊端，加之自身并未带有多少“君权神授”的光环，因此，这个同样是通过篡夺建立起来的政权，选择和制定了一种能够最广泛地笼络士大夫的政治策略，让他们都来参与政治，以增强士大夫对这个政权的向心力。这就是“与士大夫治天下”。

“与士大夫治天下”，这句话出自北宋宰相文彦博之口。熙宁时期，王安石实行变法，朝野内外议论纷纷，神宗拿不定主意，召集文彦博等大臣们商议。其间，君臣有如下对话。

文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①

“与士大夫治天下”，这句话不仅充满了一代士大夫的自豪与自信，也等于是提醒君主，我们是这个政权的合作者。它反映了一种新型的君臣关系，也清楚地表明了宋代政治的特征。与这句话适成对照，令我不禁想起了一个士大夫之死。一个叫颜见远的读书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齐做官，梁代齐后，他竟绝食而死，成为那个时代的伯夷、叔齐。梁高祖听说这件事之后，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②一介书生之死，对一个王朝来说，固然微不足道，但从今天看来，则可以说是时代的悲剧。在那个时代，士大夫之于朝廷，至多是一种雇佣、而不是做主的关系。而当历史步入宋代，则真可谓是“时代不同

①〔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

②〔唐〕姚思廉撰：《梁书》卷五〇《颜协传》。

了”，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一种势力，已经崛起，并且已经不可小视。

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与太祖、太宗一同打天下的士大夫们，为他们所建立的政权设计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政治构架。在这种政治构架之下，宋朝统治者通过科举的方式，大规模地开科取士，把视角面向全社会，汲取有用之才，这就扩大了统治基础，把一个农业社会中占人口比例并不多的掌握文化知识的精英大都网罗了进去。由于“取士不问家世”^①，读书人只要耐得寒窗苦读，在机会基本均等的竞争之下，其中出类拔萃之辈便能够脱颖而出，通过科举而跃入统治层，成为统治结构中的一分子。

人仕后的士大夫们，不再因难跳“龙门”而顾影自怜。恰恰相反，社会环境的改变，入仕的成功，“兼济天下”之志的再度激发，使他们以所投入的政权安危为己任，不再充当冷眼观世的局外人。这一切都铸成和强化了一代士大夫的责任感与事业心。“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② 20世纪初，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疾呼，似乎是宋代那“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遥远的回声。

宋代君主希望通过扩大科举考试能够恩归于己，并且将殿试制度化，以增强士大夫都是“天子门生”的观念。朝廷的各种优礼政策，使得宋代士大夫十分感激君主的知遇之恩。许多由普通庶民甚至贫民出人头地的士大夫，在对国家朝廷尽忠尽力的行为中，都包含了相当强烈的报恩成分。

出身贫寒的范仲淹自然也不例外。他是宋王朝优礼士大夫政策的受惠者。在范仲淹的所有言行中，都浸透着一种浓厚的报恩思想。不过，在他那里，已不是简单地对君主一人报恩，而是升华到为一个朝廷尽忠尽力，为这个朝廷所代表的国家的最高利益——长治久安而尽心竭虑。

范仲淹两岁时，父亲便去世了。母亲因生计无着，携其改嫁，过着一种寄人篱下的贫寒生活。青年时期，范仲淹在山间僧舍读书，饮食难济，一小

①〔宋〕郑樵撰：《通志》卷二五《氏族略》。

②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1919年8月4日。